



新华社总编室◎编

新华社十佳 编辑记者

作
品
选

(第一辑)



新 华 出 版 社



新华社总编室◎编

新华社十佳 编辑记者

作
品
选

(第一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华社十佳编辑记者作品选. 第 1 辑/新华社总编室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5011-9395-0

I. ①新… II. ①新… III. ①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1612 号

新华社十佳编辑记者作品选 (第一辑)

责任编辑: 郭信峰 赵怀志 周劭人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1

字 数: 55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9395-0

定 价: 58.00 元

温馨提示: 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 13651277005

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 xhchzx@163.com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3969

目 录

CONTENTS

第一届

编辑

吴锦才	(3)
王海征	(17)
刘富	(25)
夏林	(33)
胡创伟	(45)
于元江	(53)
巫加都	(57)
周则鑫	(69)
徐坤明	(73)
戴惠坤	(77)
侯凤菁	(83)
祝寿臣	(89)
赵柏林	(95)

记者

吴复民	(109)
吴国清	(117)
土登	(123)
慎海雄	(129)
刘海民	(133)
端木来娣	(143)
包月阳	(151)
王建民	(155)
刘江	(167)
俱孟军	(171)
郭京花	(175)
赵竹修	(179)
刘宇	(183)
何大隆	(191)
许基仁	(197)
胡晓明	(203)
熊昌义	(207)

第二届

编辑

陈芸	(213)
崔俐莎	(219)
韩松	(227)
范伟国	(231)
董琳	(237)
王晶	(247)
陈贇	(251)
徐勇	(255)
孙勇	(259)

记者

觉果	(265)
马晓霖	(271)
王岩	(275)
张非非	(287)
杨明	(297)
刘思扬	(303)
陈先发	(309)
孙杰	(323)
刘健	(329)
倪四义	(339)

第三届

编辑

李晓岗	(347)
黄燕	(353)
马小林	(361)
高山	(367)
汪东	(377)
于长洪	(383)
包尔文	(391)
陶德言	(397)
谢锐佳	(403)
姜岩	(405)

记者

曹智	(413)
朱玉	(419)
任卫东	(431)
李大宏	(441)
徐济成	(451)
刘雅鸣	(455)
明大军	(463)
周效政	(467)
何玲玲	(475)
黄敬文	(485)

第一届

· 新华社十佳编辑记者作品选 ·

吴锦才

新华社十佳编辑记者（第一届）



1962年9月生，江苏句容人，高级记者。1982年7月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先后担任新华社国内部工业组记者，财贸编辑室编辑，财贸编辑室主任，工商编辑室主任，经济编辑室主任，国内部副主任，总编辑室副主任等职。2006年5月起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参加过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道和多次“两会”报道。1985年被共青团中央命名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1992年起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被评为新华社首届十佳编辑。1995年被评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十佳青年”。2000年获第四届范长江新闻奖。2004年入选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建设队伍。采写的重要报道有《关于股市的通信》等，《水 水 水》1986年获全国新闻奖一等奖。出版有《爱与恨：一个时代的倒影》《1978—1992 中国沉思录》《决定中国方向的新因素》《中国改革：黄金时间·阳光地带》《怎样当新闻记者》等书。

■ 代表作

关于股市的通信

1992年，中国一位大科学家对中国试行股份制的看法有了改变。

他40年代在美国生活，那里的许多企业控制在大股东手里，拥有少数股票的老百姓根本没有发言权。根据这样的生活感受，他觉得在中国搞股份制不合适。

但是，到了1992年春天，他在全中国政协会议的小组会上讲了对股份制的认识。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大政方针是党和政府制定的，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又是广大职工监督的，所以，在我国股份制只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这样想，我就想通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我国试行股份制、建立股市的积极意义。中国在股市问题上的实践，打开了许多人现代经济思想的闸门。

给股市一个试验的机会。热腾腾的股市消息。刺激无数人的入市积极性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时谈到了股票的事情，他的话，给了人们解放思想的信心，股票交易成了中国第二轮改革大潮中必然要出现的现象。

股市就是拿股票上市场。1986年以后，我国只允许股票一级市场存在，企业发行的股票只能被人们拿在手上，等着收红利。这年9月，上海“飞乐”、“延中”两种股票通过银行办的证券交易柜台买卖，此后深圳几种股票也上了市。人们一方面在指定的交易场所买卖股票，想在股价的变化中赚钱，同时也在“地下”炒买炒卖股票，借全社会看好股票而抬高股价，想从中获利。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接着是深圳，揭开了中国股票交易二级市场的序幕。1992年春天上海、深圳股市暴热，几个月时间，人们就传开“万元不算富，十万才起步，百万是小户，千万算大户”的说法。

投身股市发财之快，平常人听来，简直是一个现代经济神话。国务院只同意深圳、上海两地进行股票上市试点，但很多地方也都很向往这个“政策特区”式的待遇，有的不经批准就办了证券交易所，有的把企业内部发行的股票推向了市场，有的干脆就擅自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热腾腾的深圳、上海股市消息，更成

了人们睁大了眼睛盯着的东西。据统计，上海、深圳已有 69 家股份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股份总额达 84.05 亿元，其中可上市交易的部分已达 30.2 亿元。这 30.2 亿元股票，也就是“原始股”，经过上市交易，现在市场总值约有五六百亿元。此外，全国 33 个省和城市，在没有发行规模的情况下，自行批准 247 家企业发行了 56 亿元的股票。更多的企业则在积极争取跨入“股字号”的行列。

一个新的人群概念——股民，很快产生。在上海，几年时间，正式的股民就发展到 50 万人（上海一位大学教授估计“超过 100 万人是肯定的”）。

中国这么多的人热衷于股票投资，使大量本来用于消费和银行储蓄的民间资金有可能直接投资于生产建设。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有的外国证券商对这种景象真是羡慕极了。

给企业腾挪跳跃的余地。能跃上去也会跌下来。中国的任何事都要一步一步走

股票为什么会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火爆开来？答案，其实就埋在日常的经济运行过程之中。

现在归老百姓所有的钱已经超过 15000 亿元。老百姓的钱，都去买东西，既不现实，又不应该。它们更应该尽量地把钱用于扩大再生产，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财富。这样，就需要有合理的办法来引导。对企业来说，股票是一笔不必还本的资金，而且它只在赢利时才给股民们发红利，几乎等于一笔无偿拨款。企业预计的效益好，股票还可以溢价发行，发一元股票，企业可以收入三、四元，哪个企业看了不心羡。企业与自己的股民之间实际是一个“信”字在维系着。外国人说，这是股民“用脚对企业投票”。对于经营不善的企业，股民立即抛出股票，与你“拜拜”，一点情面也不会讲。对多年来在政府的温暖怀抱中长大的中国企业来说，股票是把企业推向市场的一种有效办法。

一位权威人士把股票的好处概括为三点：第一，为经济增长筹集低成本的资金，分散投资风险，加速经济增长；第二，通过投资大众的监督和市场的压力，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第三，有利于按照市场的需要，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

深圳，几家股票上了市的企业——发展银行、万科公司、安达公司、金田公司，在都有了极大的社会知名度。靠股票，它们得到了大笔经营本钱，同时也得到了大量关注它的社会公众——这是现代工业社会至为重要的信用资本。天时——改革时代；地利——置身股市试点的深圳；人和——众多热情的股民……这些个因素综合在一起，自然造就它们的成功。

长期在政府的调节下运行的中国企业转入市场调节，远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股票一哄而起，与企业转换机制的缓慢速度相比，明显有点超前。个中道理并不复杂——当尚未完全转入市场机制的企业发行股票时，很难保证它把股市当做自己的生死存亡的唯一置放地。有“厉股份”之称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2年春天股市大热之际，反而大声疾呼“要吹点冷静之风”，指出股份制企业股票的公开发行与上市必须经过一定的审批手续，并应符合规定的条件，才能避免不规范化的股份制企业乘着“股份制热”而挤进证券市场。

现在的股市上，确实有这类“挤”进来的企业。有的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被境外的公司非法挤占，利润不实，公布的资产情况也有虚假，甚至有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也为之造假账。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利益怎么有可能得到保障？道理十分清楚：当社会对企业的管理监督机制尚未健全的时候，股民的正当收益的权利是不可能得到充分保障的；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风险。

修好渠才能放足水。股市规范必须一步步建立。不要让股票变成“疯狂的君子兰”

股票在我国发展这么快，两三年前，很少有人能料得到。如今，股市进入了一个大胆试验的新阶段。

股市牵动人心。它中间的一起一落，都决定着许多钱财的去向，进而又决定着许多人的命运。正因为此，政府要管一管股市，责任之重，使得一举一动不能不慎而又慎。

股票价格如此猛涨，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有一种意见认为“物以稀为贵”，因此可以用扩大股票发行量的办法来缓解人们的求购欲望，平抑过高的股票价格。决策部门注意到这种观点；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股票不像一般的消费品，人们购买消费品是为了满足其一定的消费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达到饱和的。所以当消费品供不应求时，只要增加供给，供求便可以达到均衡。可是，股票却不一样，大多数人买它是为了卖它，以获取超额利润，而不是为了保留它以图每年的红利，尤其是在股市的市盈率很高的情况下，股民的“正常行为”必然是买到股票后，在有利时机将其迅速抛出，因此，判断它到什么地步才能算“不稀”，是一件几乎无法做到的事情。一位学者用前些年出现过的君子兰热来比拟股市现象——君子兰，当它是一种供人欣赏的花卉时，它是一般的消费品，其供求决定的价格，符合一般消费品的供求规律。但当君子兰被某些虚幻的传言奉为可以获取暴利的神奇之物后，一切都变化了。当时抢购君子兰的人，花成千上万的钱不是为了欣赏它，而是企望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它。是君子兰

热潮中过高的流通利润，把人们卷入其中。但是，这场投机的游戏迟早要中止；一旦中止，一万元买的君子兰也许只值一两元钱。股票与它一样，搞得不好，也会出现疯狂。

决策部门的一些专家指出，现在想发行股票的企业不少，但用保护公众利益的标准来衡量，能发行股票的企业没几家。特别是我国普通群众的股票知识比较缺乏，大多数买股人根本看不懂企业资产负债表，股价一旦出现下跌，政府安定社会秩序的任务之大，远非常人能够想出。因此，中国的股市首先需要有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立法，需要有健全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需要有负责任的上市委员会掌握上市标准，需要有能够行为自律的证券商组织……政府的决策部门正在朝这个方向作出极大的努力，踏踏实实在做着打基础的工作。股市秩序尚未建立，就贸然大量上市股票，对国家、对企业、对股民不一定有利。

在大洋彼岸，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萨缪尔逊，也注意到了中国的“股票热”。他认为，市场机制尚未发展到相当程度，股票和债券交易所不应该急于建立。我国决策部门的一些专家指出，从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资本市场总是在商品市场（包括消费品市场和投资品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有可能建立和发育。现在我国商品市场还不健全，还有相当一部分商品的价格受到控制而扭曲，企业的赢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在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很不确定的情况下，不能指望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能很快地发展，只能搞试点。股份制有利于实现政企分开，但是，另一方面，股份制本身并不一定能解决经营者的自我约束机制。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借助于市场竞争和经理人才竞争机制的形成，以及各种法律法规和各种中介机构的建立和健全。当然，这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单项改革都不能孤军深入，股份制这种在商品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级的阶段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企业组织形式，也不可能脱离其他方面改革的进程而先期获得成功。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最近评论中国股市说，股份制的基本规范要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但不能离开基本规范，任意降低标准，搞自己的“土特产”。有些企业的股票要到海外上市，基本规范只有与国际市场统一才能对接，就像各种国际体育比赛，都必须有统一的比赛规则。

不少专家都提出了注意股市副作用的问题。必要的心理准备，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投身股市。深圳在股价暴涨之后的1990年12月，曾经有一次连续9个月的下跌，不少中小股民已经隐隐约约闻见了西方股市“黑色星期一”的味道，直到1991年9月股价才走出谷底，股民重生信心。

这一段日子里，人们对报上常刊出的“政府忠告市民：股票投资风险自担，

入市抉择务必慎重”的字样，有了格外深切的理解。

1992年8月中旬开始，上海股市出现过两次比较大的起伏，“上证指数”在五天内由1005.95点跌到781.77点。初入股市的股民们，为了捞回一点血本，纷纷抛股，有人为此损失上万元。股民们自己形容说像是热天里手捧冰棍，眼睁睁地看着它化为冰水。

对沪上这次股价下跌，政府主管者表示了很大的关注。但是，股价毕竟主要是市场自发决定的。上海股市的经历，让人们看到股市上不仅仅有鲜花，而且也有眼泪，更让人们看到了股市秩序需要尽快完善的地方。从9月10日开始，上海股价又有所回升，股民的情绪也趋于稳定。

赚得起也要赔得起。闯股市并不只淘黄金。普及股票知识的“ABC”

正常的股票，也就像正常的生意，有亏也有赚，而且，并没有太大的暴利。但是，津津有味说股市、闯股市的人们中，有一部分把股市当做了神奇的聚宝盆。一些听来的发财故事，引得许多人艳羡不止。大量连“市盈率”都不知为何物的人，却在梦想掏出千把元钱去买“原始股”、等着让它自个儿变成几万元、几十万元……

股市最初发热，很大一个原因出在中国股市光见人赚钱、不见人赔钱。其实，股市本身并不是印钞机，它所产生的效益主要出在一个“炒”字上。有些专家指出，股市上有个重要的指标——市盈率，说的是一张股票的市值去除以每股的税后利润，世界上一般都是十倍左右，在香港最多也就是几十倍。而在我国，由于不少人以为买了股票就能发大财，股市上的市盈率已经达到几百倍，有的甚至达到一千倍。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有专家还指出，股市上的过度投机，也容易造成货币幻觉，形成“泡沫经济”，一旦股市崩盘，势必引起社会巨大震动。

股市上怕的是盲目。投身股市，要具备哪些条件，不少人尚未仔细想过。例如，炒股票需要时间，因此最好是闲暇时间多的人来“玩股”。投身股市，对如何运用自己的资金也有讲究。常人见股票趋热，就一下子把积蓄全部投入了股票，价涨便有钱落时，一旦股价下跌，这往往使人陷入血本无归的窘境；另外，股价低落时，也往往是吃进待沽的好时机，手中没有后备资金，这时便只有往外抛的份，坐看旁人赚大钱。

股市，在经济生活中，像一匹不驯的烈马，力量很大，但它一旦恣意横行，破坏的力量也很大。我国现在这样刚刚恢复股票手段的情况下，对股票不施予一定的约束，股票必然会强烈地冲击正常的经济秩序。一些地方发行新股时，银行存款一般都被挤提走很多。确实，证券业本是银行业的竞争对手，在一个短短的

时间里，如果银行存款向股市来一个“大搬家”，那么经济秩序的紊乱可想而知，股票本身还可以溢价发行，它积聚起的资金若是无节制地流入基本建设，无形之中就会大大扩大计划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就会引起能源、原材料、交通的新一轮紧张。中国经济是否应该避免不必要的大风大浪的冲击！

看起来，在继续坚决进行股市试点的同时，中国股市有可能要经过一段短短的盘整。眼下，有大量的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规范工作需要加紧进行；国家要加强对股票市场的监管，要按国际规范组建一些监管机构，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管体系。因此在股市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总结经验，稳步前进，使股票市场能更健康地发展。

现代股市，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低成本集资方式，市场体系中一个最高层次的市场，眼下却是一个再稚嫩不过的婴孩。我们必须慎而又慎地看护它、培育它，时日不会很远了——它在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华社北京1992年9月27日电，刊载于《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本文与丁坚铭、汪洪洋合作）

■ 创作手记

引导中国股市走向中留下的一点印迹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提到股市问题，为新生的股票市场打了气。他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股票市场之所以进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视野，原因就在于它的发展正处在人们的争论之中。看，试，放，关——对社会上各种人等的态度，老人家都点到了。他的话里，最重要的是“坚决地试”这四个字。

但是，8月，中国股市遭遇一件谁也没有预料的大事——上半年来，股票价格上升，股市形成赚钱效应，股民纷纷入市，股票变得供不应求。股市扩容势

在必行。在供小于求的情况下，怎样公平地让投资者能买到股票？深圳市决定使用最传统的办法——抽签。人民银行分行和市工商局、市公安局、市监察局联合公告：发行国内公众股 5 亿股，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 500 万张，认购表中中签率 10% 即 50 万张表有效，可以购买股票 1000 股，发售时间为 8 时至 18 时，每张抽签表收费 100 元等。（今天有人回忆，那次的一张中签表差不多值 1 万元。）消息传开，从 8 日晚开始，全市 300 个发售网点都排起了长龙，总共有 120 多万人，等待出售抽签表的时刻。购表者包括男女老少、本地外地工农商学等共 120 万人。成捆的身份证特快邮递至深圳，排队者前心贴后背紧紧地挤在一起长达 10 个小时。至 8 月 9 日晚 9 时止，500 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全部发行完毕。尽管下午 4 时下起了倾盆大雨，但站队的人们仍不愿散去。一些人营私舞弊暗中套购认购表的行为被群众发现，人们怨声载道，怒不可遏。发售网点前炒卖认购表很猖獗，100 元一张的表炒卖到 300 元至 500 元，香港新闻媒体当场捕捉到炒卖镜头并迅速播放。人们打出了“反对贪污、要求公正”“反对欺骗、要求公平”“严惩不贷营私舞弊者”“吃多少，吐多少”等标语，游行示威也开始了。8 月 10 日晚，深圳市长助理出面会见请愿者，宣布市政府 5 项通告，决定再发放 50 万张认购表。还宣称：政府将彻底查清舞弊者，欢迎大家举报。人们仍不散去。午夜 12 时，警察与示威者开始发生冲突。8 月 11 日下午 2 时，新增发的 50 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兑换券开始发售，次日全部售完，秩序良好。8 月 10 日至 8 月 12 日，某家新闻单位接到举报电话几十个，接待来访群众十几批。有一家银行分行承认：共有 1.5 万张表，实际公开售出只有 4000 张，其余全部走了后门。深圳市政府认真查处了有关违纪、违法人员。

这场风波，又一次引起对中国股市的看法，各种人议论纷纷。

在这个时候，我接指示，组织采写一篇文章，讲讲如何正确看待中国股市以及下一步的股市走向。9 月 28 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我与丁坚铭、汪洪洋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关于股市的通信》。在写作和修改这篇稿件的过程中，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细致地过问此稿的修改和定稿，为这篇报道注入了强烈的政策性和思想性。写作这篇报道的情景历历在目。

（一）

《关于股市的通信》从布置题目到正式发表，历时近 3 个月。

一开始，这篇稿子就注定了其主题敏感性比较强的特点。从 1988 年开始，新华社就敏感的热点问题组织了一些重要的政论式长篇报道，如《关于物价的通信》《关于粮食市场的通信》等，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同时，这种体例也

成了一种符号性的文体：敏感，热点，重要，类似的文章才能够使用这个体式。

我当时担任新华社国内部财贸编辑室主任。国内部副主任姬乃甫同志把题目告知我时，让我找人写。于是，我找了当时在财贸编辑室和上海分社分别负责采访金融证券口的记者丁坚铭、汪洪洋同志一起，分别采访，再根据采访情况拿出初稿。

在具体指挥我们采写此稿时，姬乃甫同志不断地把中央有关部门和社领导关于股票报道的具体意见告诉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楚了中央对我国股市如何发展的指示精神，在写作中掌握了整篇稿子的基调。

但是，我们在初稿写作中还是走了一段弯路。因为股市上人们钱财的大起大落，造成了一种特别有“故事”的气氛。我们拿通常的新闻眼光采访股市实情，不免较多地着眼于具体人在钱财上的悲欢离合境遇，又因为股票问题刚在年初被邓小平同志提到，全社会各种人对它的态度也表现出很强的戏剧性。我们也以较多的笔墨渲染了股票在1992年春天里突然被人们看好的情况，以映射这个特殊年份的政治变化。这样的初稿，在写作上当然也使用了比较轻松的流行笔调，比较接近于当时流行的报纸周末版和畅销杂志文章的风格。

初稿在我们自己手上盘桓了不短的时间。后来我们意识到，这样的内容和文风，不大适宜国家通讯社作为重点稿件播发。我们尽力按这个感觉对初稿作了较大的改动后，把稿子交到了姬乃甫同志手中，稿件又层层报送到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社长郭超人同志手中。郭超人同志在稿子上批示：“许多专家认为，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些不该热的热起来了，其中主要指股市。为什么它属于不该热的东西，如果太热了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害处？这方面道理讲得不透，请再补充一点。”他还要求，写股票时心中一定要对全国的大的形势有点数；当然，在稿子中不一定具体地写出来，但心中有这个大局，才能更好地把握住股市的动向。

我们据此对稿子作了进一步修改。确实，年初股票由不吃香变得吃香，反差显示了很强的新闻性，但是，这一年形势发展太快，到年中写稿时，股市上的问题已经变“要不要搞”为“如何搞好”了。这个“热”的问题，才是我们必须紧紧跟踪的有最强的新闻性的主题。一个社会都在关心的东西，既是从社会政治角度需要紧密关注的动向，又是我们新闻记者随时要注意的题目。股市在1992年年中就正是这样一个主题。我们按这个理解对文稿作了修改后，稿子再次送郭超人社长审阅。他这次把稿中的一些提法画出来，让我们再改——像稿中写到深圳8月抽签表“骚乱”、股市上“众多的百万富翁”以及较为敏感的原野公司问题等，有的字句需要淡化，有的需要删去。然后，这篇稿子送给国务院主管股票问题的朱镕基同志审阅。

对我国新闻的送审机制，我们过去理解得不大清楚。实际上，作为国家通讯

社播发的稿件，在口径上必须与政府的观点保持一致，以免在社会上引起混乱。特别是股市上引发风波的机缘很多，报纸上的文章常常很有可能因为一两句话引出股市上的波动。记者不想把自己的文章变成文件，但是，在我国，许多地方、许多场合、许多人偏偏爱把新华社稿子里的说法当做文件精神来理解。这是一种国情，我们不能不注意自己的这种“受众效应”。

（二）

朱镕基同志对我们送去的稿子很重视。稿子是当天文传到他的办公室的。他当晚就在稿子上作了具体的批示：文章写得比较活泼，但是政策思想还要加强。对“股票热”欢迎、支持的语气要加强，要表达建立社会主义股票市场的信心和决心，然后再指出，没有基本条件，就不能保障公众利益和社会安定，因此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试点。请新华社同志和文章作者到我处一谈。他还补充写了一句：“不久前，《文汇报》发表过一篇《上海股民心态》的报告文学，可供参择。”

过了几天，我们随南振中总编辑和姬乃甫同志到中南海的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听镕基同志和他请来的几位专家谈这篇稿子。这是在星期六的下午，他刚从铁道部宣布新领导班子的会上赶回中南海。会上，先由几位专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楼继伟、国务院经贸办调研室副主任李剑阁等同志谈看法，然后，镕基同志对稿子的修改讲了几点很具体的意见：

第一点，这篇文章还是写得好的，大家一定会愿意看；一出来，一定非常重视。因此，我们很重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作用起得好，会对改革开放起到好的影响；写得不好，就会在社会上发生争论。因此，要写好这篇文章，必须作比较大的修改才能发表。我要讲的是，稿子对当前的“热”要采取一个欢迎、支持的态度，要完全与我们内部讲话区别开。我们担心股市搞得不好会出大问题，内部讲要降温、要稳妥地有步骤地搞。这篇稿子写作上有公开导向的作用，要写出：在小平同志讲话前，谁都没有想到可能“热”。这是在思想解放的条件下出来的，现在不能叶公好龙，这一点必须明确。深圳骚动、上海死人（指股民亏损自杀一事），不要突出。任何一个伟大的改革，都会出现问题，不要大惊小怪。要突出好的形势，突出人们在小平同志思想启发下大胆地干这一点。1990年上海要搞股市，小平同志对我说：我支持干，在上海搞，不会出问题。这样，我们才敢干。从1991年的情况看，有点放手，今年像决了堤似的。思想的力量不可想象。这样，稿子里的好多语言要变过来。像开头一段，说“暴富的故事”、“发